

人际评价和人际选择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张荣伟¹, 杨盼盼²

(1.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公职人员心理能力提升研究中心, 福州 350108; 2. 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 温州 325035)

摘要:采用实验法探究蕴含不同接纳-拒绝强度的人际评价和人际选择是否影响生命意义。实验1采用自我报告数据考察人际交往中人际肯定-否定评价对生命意义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肯定者的生命意义显著高于被否定者。实验2采用自我报告数据和行为数据考察团体活动中人际选择-舍弃是否也能影响生命意义。自我报告数据结果显示,控制生命意义的基线水平、正负情绪和自我概念等变量后,人际选择-舍弃显著预测生命意义,而且被选择者的生命意义显著高于被舍弃者。行为数据部分支持该结果。两个实验结果表明,蕴含接纳-拒绝的人际评价和人际选择均能影响交往对象的生命意义体验。结果暗示,在人际交往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活中应多采用蕴含接纳的交往方式以相互提升生命意义体验。

关键词:人际评价;人际选择;生命意义;实验法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6)05-0456-09

1 引言

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生命意义被心理学家所忽视。起初,生命意义不是心理学讨论的话题,而是以解构人类存在目的和意义的哲学研究议题(Battista & Almond, 1973)。但是,尼采认为意义完全是人内心构建的,探索生命意义的重任应落到心理学上(Cottingham, 2004)。存在主义心理学从存在(being)的角度考量意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只有存在才能将意义彰显出来(May, 1958)。因此,理解人类存在的本质是把握生命意义的前提条件(王德峰, 2022)。存在主义认为,人存在的根本事实是:人乃是与其它存在物相接触,并追寻意义以实现自身的存在,即人是在各种关系中追寻意义的存在(Heine, Proulx, & Vohs, 2006)。因此,本质上意义产生于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影响生命意义(张荣伟, Wong, 李丹, 2020; 张荣伟, 柯少菁, 连榕, 李丹, 2020)。

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人际世界是人存在的三种方式之一;人参与到人际世界中获得直接感受,进而发展自我意识和确立存在感及意义感(May, 1960; May, Angel, & Ellenberger, 2015)。现有研究较多聚焦于人际关系质量(如社会联结、归属感等)与生命意义之间的相关(King, 2009; O'Donnell et al., 2014; Stavrova & Luhmann, 2016),以及蕴含不同

程度接纳-拒绝的人际交往及其变式(如遗忘、记住、宽恕、感恩、助人)对生命意义的影响(Hicks, Schlegel, & King, 2010; King & Geise, 2011)。接纳(social acceptance)与拒绝(social rejection)是人际互动中常见的现象。研究表明,人际拒绝会威胁个人的社会联结或归属感、自我价值、目标等内在自我成分以及损伤认知功能,进而影响生命意义(King & Geise, 2011; Stillman et al., 2009)。人际交往有各种具体的形式或类型,如肯定或否定评价、人际选择或舍弃。符号互动论认为,符号是人们赋予事物意义的载体;人们会根据互动的符号信息来揣度他人的态度或意图以理解自我和采用相应的心理行为反馈。接纳型互动(如肯定、合作)会激发对方正性态度(如信任、支持或联结),进而增强其归属感和意义感;同理,拒绝型互动(如否定、忽视)会引发对方不良感受(如孤独感、自我否定),从而降低其意义体验(严益霞, 刘颜莹, 丁芳, 2022)。而且,不同互动方式所蕴含的接纳-拒绝强度和显性程度各不一样。然而,鲜有研究深入区分它们与生命意义的不同关系。

肯定-否定评价是个体对与之交往对象的观点、能力或行为的评价,其蕴含着明显且强烈的接纳-拒绝情绪(张锋, 沈模卫, 何亚芸, 2006)。换言之,肯定-否定评价极容易引发交往对象的被接纳

* 基金项目:2024 年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国家社科孵化项目(2024FH29)。

通信作者:杨盼盼, E-mail: panpanyang@wmu.edu.cn。

感－被拒绝感。一般而言,肯定代表或容易导向认同与接纳,它能够缩短人际距离,引发交往双方的亲近感,增强双方的情感共鸣,从而增加人际联结感和归属感,进而提升生命意义;而否定代表或容易导向不认同与拒绝,拉大了人际距离,引发交往双方的隔离感,甚至触发双方的对立或敌对情绪,从而产生人际疏离感和孤独感,进而降低生命意义(Hicks et al., 2010; Twenge, Catanese, & Baumeister, 2002; Twenge et al., 2003)。据此推测,人际肯定－否定评价会影响生命意义。

社会记忆是人类意义存在的体现(McAdams, St Aubin, & Logan, 1993)。对个体而言,被牢牢记住的事件往往是重要的有意义事件。被他人记住体现了当事人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因而能增强其存在感;反之,被他人遗忘暗示着个体不重要或没价值,从而威胁个体存在的意义感(King & Geise, 2011)。记住是一种潜在的接纳,而遗忘是一种潜在的拒绝。同理,在团体活动(social gathering)中的人际选择,选择某人作为团体活动的伙伴是一种潜在或隐性的接纳,而舍弃或没选择某人作为活动伙伴是一种潜在

或隐性的拒绝。从程度上看,被选择比被记住引发的接纳感更强,没被选择比被遗忘的拒绝感更强。综上,尽管相比于人际肯定－否定评价,人际选择－舍弃蕴含较隐性和微弱的接纳－拒绝,但是推测它仍能影响生命意义。

因此,本研究拟通过两个实验来检验蕴含不同接纳－拒绝程度的人际肯定－否定评价和人际选择－舍弃是否同样能影响生命意义。实验 1 检验人际肯定－否定评价对生命意义的影响效应,实验 2 考察人际选择－舍弃是否也能影响生命意义。

2 实验 1 人际肯定－否定评价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随机选取东南沿海某高校的 123 名大学生为被试,男生 31 人(25.2%),女生 92 人(74.8%),年龄从 19~23 周岁,平均年龄 19.74±0.96 周岁。这些被试均为第一次参加此类实验。将被试随机分成 3 组接受不同的实验处理,肯定组 48 人接收肯定性反馈,否定组 47 人接收否定性反馈,控制组 28 人接收不评价反馈(见表 1)。

表 1 三组被试的基本信息

变量	肯定组(<i>N</i> = 48)		否定组(<i>N</i> = 47)		控制组(<i>N</i> = 28)		<i>F</i>	<i>p</i>
	<i>M</i>	<i>SD</i>	<i>M</i>	<i>SD</i>	<i>M</i>	<i>SD</i>		
人口学特征								
年龄	19.81	0.70	19.76	0.77	19.57	0.63	0.94	0.39
性别	男(11)	女(37)	男(10)	女(37)	男(10)	女(18)		
生命意义								
状态生命意义	5.08	1.00	4.50	1.53	4.48	1.21	1.28	0.29
一般生命意义	4.43	1.10	5.01	1.14	4.71	1.40	1.41	0.25

注:在性别栏中,括号里的数字是指被试数。

2.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为人际评价,包括 3 个水平,即肯定、否定、控制条件,因变量为生命意义(状态生命意义、一般生命意义)。

2.1.3 研究工具

(1) 人际评价(肯定、否定和控制条件)的启动

采用不同反馈的方式操作自变量(Twenge, Baumeister, Dewart, Ciarocco, & Bartels, 2007; Twenge, Catanese, & Baumeister, 2003)。首先要求被试以“一件趣事”为题写一篇作文,然后由评委老师(主试)给予肯定、否定和控制条件等三种反馈。按 ABBA 顺序反馈且统一反馈用语。

(2) 状态生命意义问卷

采用日常生命意义量表(Daily Meaning in Life

Measure)测量被试的此刻/状态的生命意义(King, et al., 2006)。把原量表题项中表示时间范围的词“过去两天”换成“此刻”。该量表包含 3 个题项,例如“此刻,我有强烈的存在感”。题项采用 1~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当下的状态生命意义感越强。研究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King et al., 2006)。本实验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0.83。

(3) 拥有生命意义分量表

生命意义量表(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具有两个分量表,采用其中的拥有意义分量表(the presence of meaning, MLQ-P)测量被试的一般生命意义(Steger et al., 2006)。该分量表有 5 个题项,例如“我的生活有很明确的目标感”,并采用 1

~7 点计分, 得值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该分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 适合中国样本研究(刘思斯, 甘怡群, 2010; 王孟成, 戴晓阳, 2008)。本实验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0.86。

(4) 生命目的量表(PIL)

采用生命目的量表(Purpose in Life Test, PIL)中的意义和目的感(sense of meaning and purpose in life, PIL-SMP)分量表和拥有意义分量表(MLQ-P)的平均分衡量一般生命意义, 以加强一般生命意义的测量效度(Crumbaugh & Mahohc, 1964)。PIL 题项采用 1~7 级计分, 且具有较好的信效度(Mcgregor & Little, 1998; 陈艺华等, 2012)。本实验中该分量表与拥有意义分量表呈现高相关($r = 0.81$), 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0.86。

2.1.4 研究程序

整个实验分为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完成前测, 第二阶段实施变量操纵, 第三阶段完成后测。在第二阶段中, 在给被试三种反馈后, 随即进行操作检验, 即完成被接纳类型及程度、情绪状态等测量。在第三阶段, 除了让被试完成相关量表之外, 还要对否定组适当的澄清以消除潜在的负性影响。

2.1.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在 Windows 2007 系统中对数据进行分析。分析方法包括多元方差分析(MANOVA)和单变量方差分析(ANOVA)。

2.2 结果

2.2.1 肯定与否定评价的操纵有效性检验

进行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自变量为人际评价, 因变量为感知被肯定程度和情绪。结果表明, 人际评价的主效应显著, $Wilks' \lambda = 0.09$, $F(4, 140) = 85.36$, $p < 0.001$, $\eta_p^2 = 0.71$ 。进一步单因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感知被肯定程度的组别差异显著, $F(2, 71) = 381.80$, $p < 0.001$, $\eta_p^2 = 0.92$, 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 肯定组($M = 6.29$, $SD = 0.66$)、控制组($M = 4.00$, $SD = 0.00$)和否定组($M = 2.07$, $SD = 0.65$)等 3 组感知到的肯定程度得分逐级显著下降, $ps < 0.001$; 情绪的组别差异也显著, $F(2, 71) = 61.22$, $p < 0.001$, $\eta_p^2 = 0.63$, 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 肯定组($M = 6.14$, $SD = 0.71$, $n = 28$)、控制组($M = 4.76$, $SD = 1.30$, $n = 17$)和否定组($M = 3.41$, $SD = 0.87$, $n = 29$)等 3 组情绪得分逐级显著下降, $ps < 0.001$ 。以上结果表明, 人际肯定与否定评价启动是有效的。

2.2.2 肯定与否定评价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首先, 以人际评价为自变量, 状态生命意义和一般生命意义的基线水平为因变量, 进行方差分析。比较肯定评价、否定评价和控制条件等三组被试的生命意义基线水平差异。结果发现, 状态生命意义和一般生命意义的基线水平都没有显著的组别差异, $F(2, 120) = 1.28$, $p = 0.287$; $F(2, 120) = 1.41$, $p = 0.254$ 。

然后, 以人际评价为自变量, 以后测的状态生命意义、一般生命意义为因变量,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人际评价对状态和一般生命意义均有显著的影响, $F(2, 120) = 4.73$, $p = 0.011$, $\eta_p^2 = 0.07$; $F(2, 120) = 3.21$, $p = 0.044$, $\eta_p^2 = 0.05$ 。具体而言, 肯定组的状态生命意义和一般生命意义均显著高于否定组($p = 0.003$, $p = 0.017$), 而控制组与肯定组和否定组间差异均不显著, 具体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研究结果显示, 肯定评价、控制条件和否定评价三种人际交往的生命意义得分依次下降, 肯定评价和否定评价的生命意义得分差异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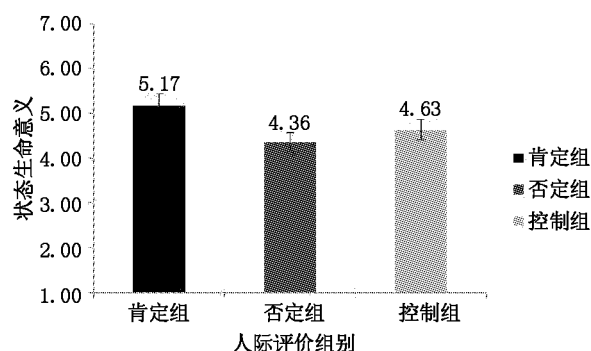


图 1 肯定 - 否定评价对状态生命意义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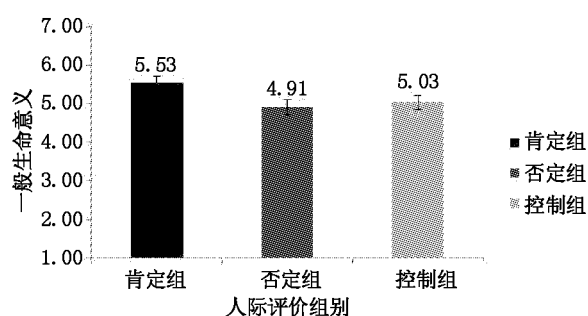


图 2 肯定 - 否定评价对一般生命意义的影响

实验 1 结果表明, 人际肯定 - 否定评价影响被评价者的生命意义。相较于人际肯定 - 否定, 人际选择 - 舍弃蕴含接纳 - 拒绝之意较隐性和微弱。那么, 它们是否也能影响生命意义值得探究。实验 2 将检验人际选择 - 舍弃对生命意义的影响效应, 并

在自我报告数据基础上,增加行为数据予以检验。

3 实验 2 人际选择 - 舍弃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选取东南沿海某高校的 61 名大学生为被试,其

中大一 41 人(67.2%),大二 20 人(32.8%),男生 32 人(52.5%),女生 29 人(47.5%),年龄从 19 ~ 22 周岁,平均年龄 19.95 ± 0.85 周岁。这些被试均为第一次参加此类实验,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且无色盲。

表 2 两组被试的基本信息

变量	选择组($N=30$)		舍弃组($N=31$)		t	p
	M	SD	M	SD		
人口学特征						
年龄	19.97	0.89	19.96	0.80	0.002	0.998
性别	男(27)	女(13)	男(15)	女(16)		
年级	大一(20)	大二(10)	大一(21)	大二(10)		
生命意义						
基线水平	4.07	0.84	4.52	0.84	-2.07	0.043

注:在性别、年级栏中,括号里的数字是指被试数。

把被试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接受团体活动中被选择、被舍弃(未被选择)的不同实验处理。表 2 为被试的基本信息。该表显示,人际选择组和舍弃组被试在年龄、性别和年级等方面没有明显差异,但在生命意义基线水平方面有明显差异($p < 0.05$),选择组的生命意义基线水平显著低于舍弃组。被试自愿参加实验,实验后获得一份礼品。

3.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为人际选择(选择 vs. 舍弃),因变量为生命意义,控制变量为生命意义基线水平、正负情绪和自我概念。

3.1.3 研究工具

(1)自我概念量表(WSCS)

采用 Wallace 自我概念量表测量整体性的一般自我概念(Wallace et al., 1984),该量表由美国密苏里大学 Gaylen R Wallace 编制。WSCS 是测量一般自我概念的简单有效工具,中文版修订由王才康和杨晓燕完成。该量表是单维,是对自我总体性的测量,由 15 对双极形容词组成,内容涉及个体对“我是怎样的人”的知觉。量表采用 1 ~ 7 级计分,反向计分题项有 6 个,分值越高表示个体对自我各方面的自我知觉越好。研究表明,中文版的 WSCS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丛中,高文凤,1999)。在本实验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2)一般生命意义量表

同实验 1,在本实验中,MLQ 中的拥有意义分量表在前后测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2, 0.84;PIL 中的意义和目的感分量表与拥有生命意义分量表呈现高相关(前测 $r = 0.77$,后测 $r = 0.82$),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2 和 0.87。

(3)正负情绪量表(PANAS)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由 20 个反映情绪的形容词组成,包含正性情绪(PA)和负性情绪(NA)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由 10 个形容词组成(Watson et al., 1988)。该量表采用 1 ~ 5 级计分。正性情绪维度得分高表示个体处在精力旺盛,能全神贯注和快乐的情绪状况,得分低表明淡漠。负性情绪维度得分高表示个体处于主观感觉困惑,痛苦的情绪状况,而得分低表示镇定。黄丽等人(2003)引进该量表,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 PANAS 的简版,其包含的两个维度均由 5 个形容词组成。研究表明,简版的 PANAS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Mackinnon et al., 1999; 黄丽等,2003;张卫东等,2004)。在本实验中,PA 和 NA 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7, 0.75。

(4)人际选择(选择、舍弃)的操纵

采用不同反馈方式操纵自变量(Twenge, Baumeister, Dwall, Ciarocco, & Bartels, 2007; Twenge, Catanese, & Baumeister, 2003; Hicks, Schlegel, & King, 2010)。以开展创新创业的集训为由招募被试,并把被试随机分成两组。一组被试被告知大部分人选择了他,即为(被)选择组,另一组被试被告知大部分人没选择他,即为(被)舍弃或不被选择组。统一反馈用语,对选择组反馈:恭喜你,大部分同学,即超过 95% 的同学投资你,选择你作为创新创业的合伙;对舍弃组反馈:很遗憾,很少同学,即少于 5% 的同学投资你,选择你作为创新创业的合伙人。最后实施被接纳度测量。

3.1.4 研究程序

首先招募被试,实施前测;然后实施实验处理;

最后完成后测及解释实验目的。其中,核心环节为完成量表后测获得问卷数据后,紧接着实施高低生命意义词汇的学习-再认实验任务,获得行为数据(张荣伟,2018;张荣伟,李丹,Wong,2020)。

3.1.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在 Windows 2007 系统中对数据进行分析。分析方法包括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层次回归分析等。

3.2 结果

3.2.1 选择-舍弃的操纵有效性检验

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先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检验人际选择和舍弃的操纵是否有效。自变量为人际选择,因变量为感知人际接纳程度。结果发现,选择组的感知人际接纳程度($M = 4.78, SD = 0.86$)显著高于舍弃组($M = 4.05, SD = 0.71$), $F(1, 59) = 13.35, p = 0.001, \eta_p^2 = 0.19$ 。此结果表明,选择和舍弃的实验操纵有效。

3.2.2 选择-舍弃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本实验把“选择”编码为 1,“舍弃”编码为 0,并以人际选择为自变量,生命意义(后测)为因变量,生命意义基线水平、正负情绪和自我概念为控制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生命意义基线水平进入第一层,正负情绪进入第二层,自我概念进入第三层,人际选择进入第四层。结果显示,在控制生命意义基线水平、正负情绪和自我概念后,选择-舍弃对生命意义仍然具有显著预测效果(见表 3)。

以人际选择(选择 vs. 舍弃)为自变量,生命意义基线水平、正负情绪和自我概念为协变量,生命意义(后测)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人际选择的效应显著, $F(1, 55) = 25.02, p < 0.001, \eta_p^2 = 0.31$,其统计检验力 $1 - \beta$ 为 0.998。选择组的生命意义得分显著高于舍弃组(见图 3)。以上结果表明,人际选择-舍弃能够影响生命意义,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表 3 选择-舍弃对生命意义的层次回归分析

变量	B	SE	β	Adjusted R^2	ΔR^2
第一层				0.147	
生命意义基线	0.403	0.12	0.402***		
第二层				0.221	0.074***
生命意义基线	0.363	0.12	0.362**		
正性情绪	0.58	0.21	0.32**		
负性情绪	-0.09	0.15	-0.06		
第三层				0.230	0.009
生命意义基线	0.356	0.09	0.355**		
正性情绪	0.37	0.27	0.20		
负性情绪	-0.03	0.16	-0.02		
自我概念	0.23	0.18	0.19		
第四层				0.461	0.231***
生命意义基线	0.521	0.10	0.519***		
正性情绪	0.02	0.24	0.01		
负性情绪	0.10	0.14	0.08		
自我概念	0.23	0.15	0.19		
人际选择	0.91	0.18	0.53***		

注:***表示 $p < 0.001$,**表示 $p < 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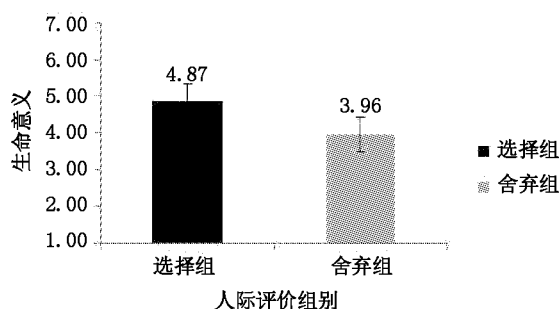


图 3 人际选择-舍弃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3.2.3 选择组和舍弃组对两类词汇再认率的差异比较

依据词汇再认率的计算方法(周仁来,2011),分别计算选择组、舍弃组对高生命意义词的再认率和对低生命意义词的再认率。结果发现,在选择组中,被试对高、低生命意义词汇的再认率未呈现显著差异($p > 0.05$);而在舍弃组中,被试对高生命意义词的再认率显著低于($p < 0.01$)对低生命意义的再认率(见表 4)。此结果部分支持信息加工与自我心

境一致性的倾向。即,人际选择-舍弃引发生命意义的变化,进而影响对相应词汇记忆差异。具体而言,团体活动中被舍弃(未被选择)影响个体的生命意义水平,使其对低生命意义词汇的记忆效果好于

对高生命意义词汇的记忆效果。但是,在被选择组中未出现信息加工与自我心境一致性的倾向,即该组被试对两类词的记忆效果无显著差异。

表 4 两组被试对高、低生命意义词汇再认率(%)的差异比较

变量	高生命意义词		低生命意义词		<i>t</i>	<i>p</i>	Cohen' <i>d</i>
	<i>M</i>	<i>SD</i>	<i>M</i>	<i>SD</i>			
命中率							
选择组	15.73	14.84	20.31	21.69	-1.41	0.167	0.25
舍弃组	7.65	14.95	17.16	15.95	-3.42	0.002	0.66

4 讨论

通过两个实验旨在验证蕴含隐性和微弱接纳-拒绝之意的人际选择-舍弃、以及包含显性和强烈接纳-拒绝之意的人际肯定-否定评价均能影响生命意义。研究结果发现,被肯定评价者的生命意义显著高于被否定评价者的,被选择者的生命意义也显著高于被舍弃者的,验证了人际选择-舍弃和人际肯定-否定评价对生命意义影响效应的一致性。即,尽管团体活动中的人际选择-舍弃所蕴含的人际接纳-拒绝之意十分微弱和隐性,但仍然能被人的大脑所觉察进而影响其生命意义。该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Sebastianet, Viding, Williams, & Blakemore, 2010; Twenge, Catanese, & Baumeister, 2003; Williams, 2012)。

实验 1 的自我报告数据验证了人际肯定-否定评价对生命意义的影响效应。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只有参与到社会互动中去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以及回答“我是谁”这一人生基本命题(Josselson, 1995),进而厘清自己与他人及与世界的关系。生命意义就是在厘清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及世界关系基础上产生的(Steger, 2006)。在社会生活中人际评价不可避免。人际是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个体需要人际评价性信息以认识自我。一般而言,个体倾向从肯定评价信息中确认自我价值,促进自我认同;而在否定评价信息中产生自我怀疑,促使自我分裂(张荣伟,李丹, 2018; 张荣伟, 2022)。而且,肯定评价信息倾向展示接纳的态度,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联结以获得归属感;而否定评价信息倾向展示拒绝的态度,使个体在不同程度上缺失人际联结感和归属感(Baumeister, DeWall, Ciarocco, & Twenge, 2005)。简言之,肯定评价的人际交往带来价值感和接纳感,否定评价的人际交往带来“伤害感”(无价值感)和排斥感,从而造成生命意义的差异。不

同的评价引发交往对象自我认知和自我态度的差异,解释了人际肯定-否定评价影响生命意义的内在机制。

实验 2 的自我报告数据结果,验证了人际选择-舍弃影响生命意义。其实,团体活动中的被选择-被舍弃也会引发交往对象自我认知和自我态度的变化。被选择是一种潜在或隐性的肯定、认同或接纳,被舍弃是一种潜在或隐性的否定、不认同或拒绝。个体会依据“被选择”这一事实信息强化自我认同,觉察自我存在的价值,肯定自我存在的意义;同理,个体也会因“被舍弃”的事实信息产生自我怀疑与否定,忽视自我优势,关注自身的劣势与不足,强化了自我无价值感和无意义感(Ohannessian, Lerner, Lerner, & Eye, 1998; Twenge et al., 2003)。存在主义认为,“否定”才是世界的本色,人总是在“不是什么”中寻找“是什么”(考克斯, 2009/2019)。因此,拒绝才是人际互动的底色,但人总是努力在交往过程寻找最大限度的接纳。相比于接纳,人对被拒绝或排斥更加敏感,十分轻微的人际拒绝线索(slightest hint)都能被人类大脑所觉察(Sebastian, Viding, Williams, & Blakemore, 2010; Van Beest & Williams, 2006; Williams & Zadro, 2005)。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词汇再认任务中的实验效应为何只在舍弃组而没在选择组中产生。即,大脑对“被舍弃”所蕴含的拒绝或排斥天生敏感,极大地降低其意义感,诱发了实验效应。

从实验 1 和 2 的内在逻辑看,价值感和联结感均可能是人际肯定-否定评价和人际选择-舍弃对个体生命意义影响的重要中介变量。联结感是人际关系质量的本质。根据社会排斥与拒绝(social exclusion and ostracism)可知,当个体遭受排斥或拒绝后联结感遭到破坏,其认知、情绪和行为会发生变化(Twenge et al., 2003; Williams, 2007)。例如,对生活的掌控感降低,自我调节能力下降,负性情绪上升

(Twenge et al., 2003), 亲社会行为减少, 攻击行为增加 (Twenge, Baumeister, Dwall, Ciarocco, & Bartels, 2007), 以及觉得生活/生命无意义。另外, 在人际肯定 - 否定评价和人际选择 - 舍弃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中, 可能存在着调节变量。例如, 受归因方式、动机或需求的调节 (张锋, 沈模卫, 何亚芸, 2006), 人际评价和人际选择并不一定引发交往对象消极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态度, 从而也可能不损伤其自我价值感和人际联结感。

根据自我参照效应的观点 (朱滢, 张力, 2001), 记忆项目与自我建立联系的认知加工具有记忆优势效应。然而, 这种效应只出现在舍弃组中; 在选择组, 被试对高、低生命意义词汇的再认率未呈现显著差异, 不符合信息加工与自我心境一致性的理论观点, 可能是因为刺激的强度不够, 即选择所引发的接纳感、价值感和联结感太隐性和微弱。换言之, 原因可能是团体活动中“被选择”诱发的“价值感或接纳程度”不够高, 进而激活意义感的量不够, 导致实验效应不显著。相比而言, 由于人类存在损失厌恶心理, “被舍弃”大大诱发“被排斥拒绝感”, 进而显著降低意义感导致出现实验效应。具体原因需未来研究进一步澄清。另外, 本研究未考虑人际交往的背景信息, 如交往对象的身份 (权威或重要) 在其中的作用, 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完善。尽管如此, 本研究验证的这一现象具有西方的研究文献支撑, 因此这个结果应该具有东西方文化的普适性。而且, 本研究对个体如何在复杂社会生活中维护自身存在的意义感仍有积极启示: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即在人际互动中, 我们应尽量挖掘交往对象的优点, 并给予肯定或积极的反馈; 如果不可避免地要指出对方缺点或舍弃对方时, 也要尽量不伤及价值感以及维护与人的联结感, 或者也可以发挥当事人积极归因, 使其自我认知和自我态度不受负性影响, 进而维护好被接纳和联结的感受。

5 结论

蕴含人际接纳 - 拒绝之意的人际交往影响交往对象的生命意义。不但蕴含显性且强烈人际接纳 - 拒绝之意的人际肯定 - 否定评价影响交往对象的生命意义, 而且蕴含隐性且微弱的人际接纳 - 拒绝之意的人际选择 - 舍弃也影响交往对象的生命意义。

参考文献

陈艺华, 叶一舵, 王丽馨, 梁世钟, 孙洁. (2012).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2(6), 423 - 426.

- 丛中, 高文凤. (1999). 自我接纳问卷的编制与信度效度检验.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1), 20 - 22.
- 黄丽, 杨廷忠, 季忠民. (2003).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适用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7(1), 54 - 56.
- 刘思斯, 甘怡群. (2010).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6), 478 - 482.
- 王德峰. (2022). 寻觅意义. 山东: 山东文艺出版社.
- 王孟成, 戴晓阳. (2008). 中文人生意义问卷 (C - MLQ) 在大学生中的适用性.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5), 459 - 461.
- (英) 加里·考克斯. (2019). 如何成为一名存在主义者 (张志佑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严益霞, 刘颜莹, 丁芳. (2022). 心理理论与社会互动方式对初中生社会善念发展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38(4), 485 - 494.
- 张锋, 沈模卫, 何亚芸. (2006). 自尊对自我确认倾向的影响: 来自人际选择的证据. *心理科学*, 29(6), 1376 - 1381.
- 张荣伟. (2018). 大学生生命意义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 张荣伟. (2022). 探寻生命意义: 测量、变化与理论基础.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44(3), 83 - 91.
- 张荣伟, 柯少菁, 连榕, 李丹. (2020). 人际交往能力与生命意义的关系: 孤独感和年级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5), 576 - 583.
- 张荣伟, 李丹. (2018). 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基于生命意义理论模型的整合. *心理科学进展*, 26(4), 744 - 760.
- 张荣伟, 李丹, Wong. (2020). 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 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心理科学*, 43(6), 1506 - 1513.
- 张荣伟, Wong, 李丹. (2020). 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一项追踪研究. *心理科学*, 43(5), 1154 - 1161.
- 张卫东, 刁静, Schick, C. (2004). 正、负性情绪的跨文化心理测量: PANAS 维度结构检验. *心理科学*, 27(1), 77 - 79.
- 周仁来. (2011). *心理学经典实验案例*.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朱滢, 张力. (2001). 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 *中国科学*, 31(6), 537 - 543.
- Battista, J., & Almond, R. (1973). The development of meaning in life. *Psychiatry*, 36(4), 409 - 427.
- Baumeister, R. F., DeWall, C. N., Ciarocco, N. J., & Twenge, J. M. (2005). Social exclusion impairs self-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4), 589 - 604.
- Cottingham, J. (2004). *On the meaning of life*. Louisville, Kentucky: Presbyterian Publishing Corp.
- Heine, S. J., Proulx, T., & Vohs, K. D. (2006). 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On the coherence of social motiv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2), 88 - 110.
- Hicks, J. A., Schlegel, R. J., & King, L. A. (2010). Social threats, happiness, and the dynamics of meaning in life judgment.

- me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0), 1305 – 1317.
- Josselson, R. (1995). *The space between us: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King, L. A. (2009). Positive mood and social relatedness as information about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4(6), 471 – 482.
- King, L. A., Hicks, J. A., Krull, J. L., & Del Gaiso, A. K. (2006). Positive affect and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1), 179 – 196.
- King, L. A., & Geise, A. C. (2011). Being forgotten: Implications for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1(6), 696 – 709.
- May, R. (1958). Contributions of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In R. May, E. Angel, H. F. Ellenberger, R. May, E. Angel, & H. F. Ellenberger (Eds.), *Existence: 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pp. 37 – 91). New York, NY, US: Basic Books.
- Mackinnon, A., Jorm, A. F., Christensen, H., Korten, A. E., Jacomb, P. A., & Rodgers, B. (1999). A short form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Evaluation of factorial validity and invariance across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a community sample.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7(3), 405 – 416.
- Meadams, D. P., St Aubin, E. D., & Logan, R. L. (1993). Generativity among young, midlife, and older adults. *Psychology & Aging*, 8(2), 221 – 230.
- May, R. (1960). Existential bases of psycho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30(4), 685 – 695.
- May, R., Angel, E., & Ellenberger, H. F. (2015). Existence: 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Psychosomatic Medicine*, 20(6), 496 – 497.
- Mcgregor, I., & Little, B. R. (1998). Personal projects, happiness, and meaning: On doing well and being your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4(2), 494 – 512.
- O'Donnell, M. B., Bentele, C. N., Grossman, H. B., Le, Y., Jang, H., & Steger, M. F. (2014). You, me, and meaning: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connections between relationships and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Africa*, 24(1), 69 – 79.
- Ohannessian, C. M., Lerner, R. M., Lerner, J. V., & von Eye, A. (1998). Perceived parental acceptance and early adolescent self – compet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8(4), 621 – 629.
- Sebastian, C., Viding, E., Williams, K. D., & Blakemore, S. J. (2010). Social brain development and the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ostracism in adolescence. *Brain & Cognition*, 72(1), 134 – 145.
- Stavrova, O., & Luhmann, M. (2016). Social connectedness as a source and consequence of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5), 470 – 479.
- Steger, M. F., Frazier, P., Oishi, S., & Kaler, M. (2006).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1), 80 – 93.
- Stillman, T. F., Baumeister, R. F., Lambert, N. M., Crescioni, A. W., Dewall, C. N., & Fincham, F. D. (2009). Alone and without purpose: Life loses meaning following so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4), 686 – 694.
- Twenge, J. M., Baumeister, R. F., Dewall, C. N., Ciarocco, N. J., & Bartels, J. M. (2007). Social exclusion de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2(1), 56 – 66.
- Twenge, J. M., Catanese, K. R., & Baumeister, R. F. (2002). Social exclusion causes self – defea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3), 606 – 615.
- Twenge, J. M., Catanese, K. R., & Baumeister, R. F. (2003).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deconstructed state: Time perception, meaninglessness, lethargy, lack of emotion, and self – awar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3), 409 – 423.
- Van Beest, I., & Williams, K. D. (2006). When inclusion costs and ostracism pays, ostracism still hur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1(5), 918 – 928.
- Wallace, G. R., Spaner, S. D., & Filer, P. S. (1984). Factorial comparison of the Wallace Self – Concept Scale between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regular classroom teacher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44(2), 199 – 207.
- Watson, D., Clark, L. A., & Tellegen, A.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1063 – 1070.
- Williams, K. D. (2007). Ostracism: The kiss of social death. *Social &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1), 236 – 247.
- Williams, K. D. (2012). Ostracism: The impact of being rendered meaningless. In P. Shaver & M. Mikulincer (Eds.), *Meaning, mortality, and choice: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xistential concerns* (pp. 309 – 323).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Williams, K. D., & Zadro, L. (2005). Ostracism: The indiscriminate early detection system. *Sydney Symposium. Unsw. Edu. Au*, 77(4), 19 – 34.

The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Evaluation and Interpersonal Choice on Meaning in Life

Zhang Rongwei¹, Yang Panpan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nhancement of Mental Capacity of Public Officials,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Fujian Academy of Governance) ,Fuzhou 350108;

2. School of Mental Health,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two experiments for the purpose of testing the effect of two kinds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which including interpersonal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n meaning in life. In Experiment 1, we gained self-reported data to examined the effect that explicit and strong accepted-rejected kind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 e. interpersonal positive-negative evaluations, influenced the meaning in lif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aning in life(daily and general meaning in life) of the being positively evalu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being negatively evaluated group. The meaning in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as in equal to each other before experiment 1. This indicated that this kind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 e. positive-negative evaluations affect meaning in life. However, does the interpersonal choice-rejection which contains implicit and weak acceptance-rejection also affect the meaning in life? In Experiment 2, we got self-reported data and behavioral data to further investigate whether implicit and weak accepted-rejected type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 e. interpersonal being selected-rejection(no being selected) in group activities, affect meaning in lif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erpersonal being selected-rejection still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meaning in life after controlling the baseline level of meaning in lif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self-concept. The meaning in life of the being selecte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being unselected(rejected). Behavioral data partially supported this result. This also suggested that interpersonal being selected-rejected, the implicit and weak accepted-rejected kind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ffected meaning in life. In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containing the meaning of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will influence meaning in life of the people who are contacted. The findings also suggest that a good word makes people warm like a fire in the cold winter, while a bad one hurts people seriously just like snowing in the summer. The use of good words and avoiding bad words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can preserve or enhance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evaluation; interpersonal choice; meaning in life; experiment studies